

中國古代韻書

中 国 古 代 韵 书

赵 诚 著

中 华 书 局
1980年·北京

中国古 代 韵 书

赵 诚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 4¹/4 印张 82 千字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30,801—47,000 册

统一书号：9018·96 定价：0.35 元

目 录

前 言	3
第一章 韵书产生的条件	5
第二章 韵书的萌芽和发展	10
第一节 李登《声类》.....	10
第二节 吕静《韵集》.....	13
第三节 六朝韵书.....	17
第三章 韵书的定型、修订、增补.....	21
第一节 陆法言《切韵》.....	21
第二节 《切韵》的刊谬补缺.....	31
第三节 《唐韵》.....	36
第四节 李舟《切韵》及其它.....	43
第四章 官韵的形成	46
第一节 《广韵》和《韵略》.....	46
第二节 《集韵》.....	56
第三节 《礼部韵略》.....	61
第五章 正统韵书的改革	66
第一节 《五音集韵》.....	66
第二节 《古今韵会举要》.....	73
第三节 《洪武正韵》.....	80
第六章 《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	85
第一节 《中原音韵》.....	85

第二节 《韵略易通》	89
第三节 《韵略汇通》和《五方元音》	92
第七章 平水韵和诗韵	96
第一节 平水韵简述	96
第二节 明清诗韵	98
第八章 词曲韵书	105
第一节 词韵专书	105
第二节 曲韵专书	111
附 录	117
一、四家韵书分韵表	117
二、《广韵》《集韵》韵目用字、次序及韵目下所注同用独 用例差异表	122
三、《韵会举要》七音三十六类表	124
四、主要词韵韵目比较表	126

前　　言

中国古代韵书，对于探索我国历史上某些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对于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对于了解古人写诗填词制曲和韵书的关系，都有一定帮助。古代韵书，有的保存了不少古字古义，有的集中了不同时期的异体字、通俗字。这一些，对于阅读古代文献，研究汉字演变的历史，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总之，韵书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方面，批判地加以继承，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国古代韵书，象历史上产生的任何事物一样，有着自己的发生、发展过程。本书在介绍各种韵书的体制、特点、作用、影响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所以，这本小册子也可以称为《中国韵书史略》。

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根据前代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初稿完成于 1963 年，经过了多次修改，到 1978 年才写定。在修改过程中，承黎锦熙、周祖谟、启功先生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志此表示感谢。

赵　诚 1978 年 9 月



第一章 韵书产生的条件

我国古代韵书，是按照声、韵、调的关系将汉字组织起来的字典。因为着重在划分韵部，简而言之，又可以说成是分韵编排的字典。

韵书的编辑体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先按照汉字声调分类；再在每一声调下分韵部；然后在每一韵部内按同声字分类排列，《广韵》就是如此。

第二类：先分韵部；每一韵内再按声调分开；然后在每一声调内按同声字分类排列，如《中原音韵》。

第三类：先分韵部；每一韵内再按声母分类，然后再在同声字内按声调分开排列，《韵略易通》就是如此。

总之，不管怎样分类编排，都与汉字的声、韵、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不言而喻，汉字的声、韵、调就是韵书构成的基础。

汉字的声、韵、调被人们认识并加以分类，曾有一个过程。这要从我国古代反切的产生和盛行、四声现象的发现和归纳谈起。

反切是音韵学上一个常用的术语^①。所谓反切，是古代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字急读拼出另一个字的读音。如“东，德红反”，就是用德、红两个字急读拼出东的读音。在音韵学

^① 请参看有关汉语音韵一类的专书，这里只是简介。

上，“东”叫被切字，“德”叫切上字，“红”叫切下字。拼时取切上字的声，取切下字的韵和调，公式如下：

德(切上字) 红(切下字) 东(被切字)

d | e + h | ong → dong

这就要求切上字和被切字同声，切下字和被切字同韵同调。反过来说，只要和被切字同声的字就可以作为切上字，和被切字同韵同调的字就可以作为切下字。所以，同是一个被切字，可以有不同的切上字和切下字。比如东字，《集韵》就作都箋切。在没有注音字母、拼音字母以前，反切是古代比较好的注音方法，所以一直到《辞源》、《辞海》还沿用。

现在所看到的最早的反切，都写成“××反”。到了后来，一方面由于避讳“反”字，一方面也是人们对反切的认识有了改变，才改写为“××切”。所以现存的唐写本韵书残卷都写作“××反”；宋以来的韵书绝大多数都写作“××切”。

反切到底是谁创造的，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这里只说说它产生的条件。

我国古代有所谓急读、缓读之法。急读实际就是两合读法，如《春秋》中有“吴子乘”，在《左传·襄公十二年》写作“吴子寿梦”，“乘”就是“寿梦”的合音。急读之是“乘”，缓读之就是“寿梦”。又如《左传·哀公五年》有“公子鉶”，《左传·哀公六年》写作“公子且于”，“鉶”就是“且于”的合音。其它如“大祭”和“禘”，“邾娄”和“邹”，“蒺藜”和“茨”，“何不”和“盍”，“之焉”和“旃”，“不可”和“叵”等等，都是这种关系。这种急读合音在汉语里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现代口语里，北京的“甭”；广州的“僭”；苏州的“镴”；山东人说“那样”为“nàng”，说“这样”

为“zhàng”等等也是这种现象。

到了汉代，我国逐渐和外国有了文化和经济上的交往，尤其是佛经的传入，古人对音素文字^①的语言有了愈来愈多的接触，对于拼音也就有了较深的认识。反切的产生，大概就是由于上述的两个条件。不过，我国固有的急读合音法是内因，是基础；外语拼音法的启发是外因。

反切法要求切上字和被切字同声，切下字和被切字同韵。把一个字用反切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必须对汉字的声类和韵类作一番研究。即使不是先研究而后制作，那么在制作之后，人们通过反切也能较深入地认识汉字的声类和韵类。声和韵是韵书组成的三大基础中的头二个（另一个是声调），所以也可以说反切的创造和大量制作是韵书得以产生的主要条件之一。

我国古代有所谓长言、短言。长言就是把字音读长一点；短言就是把字音读得短一些。比如《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有这样一段记载：“春秋也，伐者为客，伐者为主”，这两个伐字如何区别呢？汉代的何休注解说：“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实际上这种长言、短言的区别就是声调的不同，只不过古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汉语的声调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比如现代汉语的“钉”，读阴平是名词，读去声则是动词。当一个词由于声调不同而表示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又无其它现象（如字形或不同的上下文）可以辨认时，注疏家怕读者误会，而自己又不懂得这

① 音素文字就是拼音文字，它的每一个字都由若干字母拼成，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音素。

就是声调的问题，于是才根据该词的实际读音，注明一是长言，一是短言]。上古汉语的声调到底有几类，现在尚无定论。直到六朝，才被一些文学家如周颙、沈约等发现并归纳成平、上、去、入四类。

四声的发现和归纳，与当时文人注意音律有很大关系。《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梁书·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在当时讲究诗歌音律的文人中间，有人还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高氏小史》记“齐中书郎周颙字彦伦，始作《四声切韵》行于时”。唐封演《闻见记》：“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这些书现已不存。是从语言声调的发现进而注意到诗歌创作的音乐美呢，还是因为讲究文学创作的声音和谐而发现、归纳出了四声？恐怕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反切和四声是韵书得以产生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条件。而直接促使韵书产生并大量编制的因素，主要还是文学创作上的要求。

作家在文章创作中注意音调的和谐，自屈原以来就开始了。但在文学史上正式作为声律论而被提出来，最早的是晋代陆机的《文赋》：“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鲜”。

这还只是抽象地谈到诗歌和声韵的关系。到了六朝，由于文人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讲究，就由沈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意，始可言文。”（见《宋书·谢灵运传》）并归纳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诗歌声律中的所谓“八病”。这样一来，作文讲究声律就渐渐成了一时风尚，“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见封演《闻见记》）

汉语是方块字，从形体上很难看出声音结构；何况当时讲究声律，做诗押韵有很严格的要求，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并掌握，客观上就要求有一个用韵的规范，著之于文，以便参考。这就是韵书。六朝时编制了大量的韵书，就是这种要求的体现。

第二章 韵书的萌芽和发展

第一节 李登《声类》

我国古代韵书，根据文献记载，最早的是魏李登编的《声类》和晋吕静编的《韵集》。隋潘徽《韵纂·序》说：“《三苍》《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文》《字林》之属，惟别形体。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酌古会今，未臻切要。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商”。^①

李登这个人，不见于史传，关于他生平的详细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声类》一书，今已不传。《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唐封演《闻见记》说“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封演大概生于唐开元末到元和（约公元735—810年）之间。他记述《声类》、《字林》、《字统》、《玉篇》、《切韵》等书的字数很详细，想来他看过这些书。由此推想，李登的书到唐代中叶以后才散失。

《声类》的编排体例，由于书已不存，只能从有关记载知道一个大概：

1. 不分韵部。
2. 全书收字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比《说文》多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按五音——宫、商、角（角）、徵、羽编排；共

^① 《隋书·潘徽传》。

十卷。

3. 有注释。

关于五音，历来争论很多，直到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宫、商、鶡、徵、羽原来是古代音乐上用的术语。大概李登认为音乐和语言的声韵有密切关系，所以借来用在他的书里。然而借用来的“五音”到底指什么，李登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解释，后代的学者就不得不根据其它材料进行推测。唐徐景安《乐书》以为就是指的四声：宫是上平声，商是下平声，徵是上声，羽是去声，角（即鶡）是入声^①。也有人认为五声指的是喉、牙、舌、齿、唇。王国维根据周、秦、汉初人的用韵和文字形声的关系，论证即古音的五声：“阳声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是也”。并断言徐景安之说决不能成立^②。唐兰不同意以上各种说法，认为五音实指韵部：“宫者东冬，商者阳唐，角者萧宵，徵者咍灰，羽者鱼虞”。同时指出“创始者粗疏，故但列五部耳”^③。姜亮夫则根本否认李登的著作是韵书。他认为李登所处的时代，去四声的兴起还很远，不能有韵书；五音决不是四声或王国维所说的五声，至多是以“音乐性的方法”来分析汉字而已^④。

上述各家说法^⑤，都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揣测，至今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公认。五音究竟是什么，还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① 王应麟《玉海》卷七。

② 中华书局影印本《观堂集林》页341—343。

③ 彩华印刷局影印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后面唐兰的跋语。

④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5年7月第一期《切韵系统》。

⑤ 五音为何，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不一一列举。

《闻见记》把对于《声类》的叙述列在“文字类”中。而在“声韵类”这一部分里，首先叙述了周颙、沈约等把四声用到文章里；其次介绍按四声编韵的《切韵》、《唐韵》；最后讲他同时代的颜真卿按韵编辑的而又并不是韵书的《韵海镜源》。封演是见过这些书的，他这样分列叙述，不会没有理由。从他把《声类》列入文字类而不和《切韵》等书放在一起来看，《声类》一书大概不是象后代按四声编韵的韵书，至少封演是这样看的。大凡一种新兴的事物，它萌芽时的形状和定型时的样子总不会一样。李登的《声类》是韵书的胚胎（按五音分类编排的字表）；后来隋陆法言的《切韵》是定型之作，两者有一定的差别本是极自然的事，我们不必以《切韵》为准去否定《声类》，也不必因为《切韵》是由《声类》发展而来就说两者完全一样。

潘徽曾批评李登的书“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①。颜之推也指出“李登《声类》以‘系’音‘畀’，不可依信”^②。可见李登在审音、考古方面的水平并不高。不过，这并不淹没他在韵书史上的创始之功。

《声类》久已不存，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清以来的各种辑佚本。从辑出来的资料看，李登一书在训诂上还有不少贡献。如《说文》以“吹”解释“嘘”，以“嘘”解释“吹”，似乎“吹”和“嘘”是一回事。李登就指出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出气缓曰嘘，出气急曰吹”。又如《左传·闵公二年》：“归夫人鱼轩”。注：“鱼轩，夫人车”。又《左传·哀公十五年》：“服冕乘轩”。注：“轩，大夫车”。《说文》解释“轩”是“曲辀藩车”，意思是说这种车的

① 《隋书·潘徽传》。

② 《颜氏家训·音辞篇》。

轤^①弯曲向上，车两旁有象窗户那样的遮蔽物（藩）。这只是从形制上指出“轩”和一般的车不同之处。《声类》在“轩”字下注云：“安车也”。安车是一种坐着乘的车子，古代只有妇女和七十岁以上的大夫才可以用。从《声类》我们才知道，“轩”即是安车，不仅形制，连乘法也和一般车子不同。

第二节 吕静《韵集》

吕静，我们只知道他是晋人，任过安复令。他的哥哥吕忱，是一个小学家，曾仿照《说文》编过一部《字林》。

潘徽《韵纂·序》把李登和吕静相提并论，后魏江式《上古今文字源流表》更明白指出：“忱弟静别仿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想来这两部书在编制体例上有近似或相同之处。

《韵集》一书也早已散失，《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六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五卷。作“六”卷可能有误。其书既然按五音各为一篇，按常理应为五卷；如每篇分上下，也当如《声类》那样作十卷。

近几十年发现了三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简称《王韵》）的唐写本。第一种是敦煌出土的，被帝国主义文物盗窃分子伯希和劫往法国，现藏巴黎国民图书馆，简称“王一”^②；

① 古代大车的轤叫轤，小车的轤叫軒，现在不管大小都叫轤。軒比一般的车小，故《说文》以軒称之。

② 敦煌出土的东西很多（韵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多被伯希和（P. Pelliot）和斯坦因（M. A. Stein）这两个帝国主义文物盗窃分子劫往法国和英国。伯希和掠去的那一批现藏巴黎国民图书馆，用 Pelliot 编号，“王一”是其中的一种，编号为 Pelliot 2011，简称为 P2011，余仿此。斯坦因掠去的那一批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用 Stein 编号。这两批，我国仅有显微胶卷，分藏于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里讲的“王一”，即 P2011，刘半农《敦煌掇琐》、《十韵汇编》和姜亮夫《瀛涯敦煌韵释》皆收入。

第二种是项子京跋本，简称“王二”^①；第三种是宋濂跋本，简称“王三”^②。这三种王韵的韵目下有小注^③，指出陆法言《切韵》以前五家韵书分韵的异同。其中就有吕静的《韵集》。三种《王韵》韵目小注的个别字句之间略有出入，今以“王三”为主，以“王一”、“王二”比勘校对将有关《韵集》分韵的情况列在下面（见15页表）。

括号里的“××别”、“××同”，是《王韵》小注下原有的。所谓“××别”，是说×与×有分别，如“冬鍾江别”就是说冬、鍾、江这三部是分开的。所谓“××同”，是说×与×相同，如“董腫同”，就是说董韵和腫韵相同，不必分为两部，所以只列出腫而不再列董。

此表是按《广韵》韵目四声相承的关系排列的。表面看来，《韵集》一书，似乎韵部的划分已基本完成；由“先铣霰屑”、“仙狝线薛”、“阳(唐)养(荡)漾(宕)药(铎)”、“灰贿队”、“咍海代”、“魂混恩没”、“尤有宥”、“俟厚候”等四声相承的情况看来，似乎已分四声。如果综合其它材料来看，又好象不是这样：

1. 《韵集》既然是以五音命字，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同时晋代还没有兴起四声之说，吕静又怎样按四声分韵呢？

2. 封演说《声类》是“不立诸部”，即尚未分韵部。如果

① “王二”有延光室照片本、唐兰手写影印本，《十韵汇编》也收录。此书严格讲来是一种汇合本刊谬补缺切韵，作者也未必是王仁昫。考证不是本书重点，所以暂从旧说。

② “王三”有彩华印刷局影印本。

③ “王一”只有上平声；“王二”存上、去、入三声，也略有残缺；“王三”全。